



一套书与一个知识领域的引进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走过 25 年

■本报记者 王洪波

“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一个知识领域、一个学术传统。当今中国学界,几乎罕有人不受这套书的影响。”前不久召开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 25 周年座谈会上,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告诉记者。丛书影响之大,甚至让刘东有了新的“忧虑”：“现在国内一些学者研究中国也净是汉学意识,年轻学子更是惟恐学汉学家的风格学得不好,这恐怕也是问题。”

25 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 150 多种书,作者名单是一长串耀人眼目的名字: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易劳逸、韩书瑞、瓦格纳、杜维明、沟口雄三从书中,除了新书外,重印率 90% 以上(对于学术类图书,这一数据堪称罕见),这套书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起步并非一帆风顺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起步是在 1980 年代末。那是一个知识界、出版界都极为活跃的年代。“文化热”方兴未艾,书界有多套丛书做得风生水起,尤其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世界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世界丛书”,都大获成功,使得同为地方出版社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也要组织一套像样点的丛书。

1987 年下半年,还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普通编辑的周文彬和同事找到了当时尚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刘东。刘东给出版社提了不少建议,并透露,自己有意编一套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丛书。

当周文彬等信息带回社里,社领导总意见却颇不一致。有人以为这样一套书会很出新意,在当时汲汲于种种洋思潮的丛中,可谓独树一帜。但也有觉得外国人怎么可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中国,研究中国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引进西

学还说得通,引进西方的“中学”有必要吗?最终,还是肯定的意见起了作用,丛书被列入出版计划。

现年 81 岁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史家骅回顾说,他因为当过《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一书的编辑,对海外社科研究的水平有一点点了解,所以对这套书的出版表示了支持。“经过多年闭关锁国,我们不但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对国情的认识也有很大偏差。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角度、方法、理论背景和我们都不一样,他们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对我们认识自身是有帮助的。”

出版工作于 1988 年启动,但刚一起步就遭遇了夭折风险。1989 年,丛书的第一本图书就由于特殊的原因被暂停发行。

从 1989 年到 1992 年,丛书第一辑相继出版,包括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费正清等著《中国:传统与变革》、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均为名家名作,受到读者追捧。

就在学界的一片叫好声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却不得不面对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有些人觉得出版外国人谈论中国的书,观点和我们又不尽相同,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还有人根本没看过这套书中任何一本,就抱着否定的态度——这样的声音如果来自某些大人物,就会带来好大麻烦。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叫停的声音不断,以致有的年度只出了两三种。

经济效益不理想也是反对这套书的理由。大约 1999 年,一个分管领导找到了时任社长的吴源,就说:“这个书出个没完没了,要出到哪天啊?”他觉得,经济上压力很大,就想把这套书停掉。吴源说,这套书社会影响很大,现在经济上是持平,将来其实是有赢利的希望的。另外,这套书和一般丛书不一样,海外中国研究队伍庞大,会不断有好书出来,也可以持续下去。经过坚持,这套丛书被保住了。

如今已经退休的周文彬谈到参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长期使用几种统一设计的封面(图 1~3),此外丛书也有一些特别版(图 4)(从左至右依次排序)

与这套书的经历非常动情:“出版人的使命就是出好书。但在那个年代里,出版人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基本上是上面交来什么任务就出什么。因此,这套书出版过程中才会有那么多难曲折,好在出版社坚持下来了,没有让这套书夭折。我认为,出版人应该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且应该体现到编辑工作中去,这是我退休以后想得越来越明白的一个问题。”

版权交涉及与汉学家的交情

丛书刚刚启动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他国家的作品,也就没有购买版权这回事。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合作完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参与翻译出版事宜的人多来自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成立的中美文化中心,美方负责人就说,你们翻译这本书,要遵守美国法律,购买版权。“于是我们‘多此一举’,支付了版权费 50 美元,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刘东说。

1992 年 10 月,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就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一时间,国内翻译图书的数量大为减少。“我们这套书受到的影响并不

大,个中缘由是:第一,汉学家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对于从中国获得版权收益不抱大期望;第二,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不少汉学家都以自己的著作被收入其中为荣,不会计较版权费。”刘东回忆说,1990 年代,他们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汉学重镇之一)购买版权,每本书仅仅支付 100 美元,“也就是意思一下”。

实际上,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海外学者对其认同度也与日俱增,很多人又特别希望自己研究中国的著作能够为中国读者看到,因此在版权方面给予了热情襄助。像近年出版的《中国善书研究》、《诗经》原意研究,版权都是作者赠送的。

刘东回忆说,曾有一位德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希望译成中文出版。甚至,其人还表示,愿为刘东提供到德国访学半年的机会。但刘东看了书之后,觉得质量平平,因此拒绝了其“好意”(而那时国内学者出国访学的机会还不像今天这样容易获得)。

若干年来,刘东与海外汉学家的联系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刘东说,自己属于国内较早使用 e-mail 的一批人。那时,他从威海威得到一个邮箱,开始磕磕绊绊,很不顺畅地与海外汉学家进行联系。多年后,他和很多汉学家都成了朋友。到了国外,他常常住在这些人家里,和他们称兄道弟,把酒

言欢,微醺之际,听他们聊学界八卦,和他们月旦学界人物。这样的过程中,刘东对海外中国研究学界的了解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程度,无疑,这对他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会有很大助益。

不过说起来,版权的事情有异常的复杂性,目前工作中,出版社最感困扰的也还是版权问题。由于中国出版界对这方面著作的兴趣普遍日益提升,争抢版权的情况便日趋严重,造成一种乱象,而且版权费用也水涨船高。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作者对自己的书版权由谁持有也搞不清楚,以致译本早已现成,却就是不能出版。此外,论文集的引进也有特殊的难度,因为很多论文的版权都是难于轻松搞定的——但论文其实代表了一个学者的研究水平,其重要性往往超过专著——这是让刘东觉得遗憾的事情。

“对海外汉学家不应顶礼膜拜”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 15 周年的时候,刘东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为《熬成传统》,一个“熬”字,道尽了做这套书的不容易。但过了“熬”的阶段之后,丛书的发展就越来越顺利了。目前,丛书每年推出新书 10 种左右,并于近年新设了“女性研究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研究系列”等子系列,出版的图书如《中国与达尔文》、

《欧几里德在中国》、《帝国的隐喻》、《皇帝与祖宗》、《危险的边疆》等都赢得了一片喝彩。

但“熬成传统”之后,新的问题也来了。刘东说他现在的忧虑和过去几乎是相反的:“对中国,有个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可是国际的压强实在太大了,对内部研究造成了太大影响。一方面这套书向国内学界示范了做学问的基本规范、方法之类;另一方面,也导致我们的学者头脑里有了越来越多的汉学意识。我们本来是拿别人的视角作为参照的,结果他们的视角也变成了我们的视角。”

“比如,有的海外学者为文革唱赞歌,我们也有人跟着鹦鹉学舌。这些海外学者没经历过文革,说不定其对文革的误读对他们的国家还有启发性呢。但对于中国人而言,除非丧心病狂,怎么能说文革好呢?”刘东将海外的中国研究学界分为三个圈子,一是大学里的学者,二是智库人员,三是记者之类人员(如埃德加斯诺)。“众声喧哗的‘中国观察’中,其实也有很多不靠谱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另外的问题是,一面是海外中国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目前总数已达数千人之巨,而中国留学生还不断想方设法地加入进去;每逢亚洲学会召开年会,人们简直就像走进了众声喧哗的学术超级市场,往往需要许多分会场从早到晚地齐头并进。但另一面却是,随着列文森、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等大师级学者的相继离世,却难以看到有同样量级的学者顶替他们的位置。海外中国研究学界能否涌现出新的大师级学者,能否不断有出色十足的精彩著作问世,将决定“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将来的命运如何。

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但同时,刘东越来越觉得,中国知识界对海外汉学家不应顶礼膜拜,而是要将其作为对话的对手,“让中国的国史迎着汉学的挑战,并力争高,这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 60 多年之信念。2010 年 12 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谋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杨人 ■ 与民国教科书《高中外国史》

■陈其

1929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颁布《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根据《课标》,历史学家杨人■编写了《高中外国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1 年出版上卷,1934 年出版下卷。该教科书自成系统、体例新颖、叙事详尽、分析清晰,成为继陈衡哲的《外国史教本》之后最受青睐的历史教科书。

杨人■,著名历史学家,擅长世界史研究,1949 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初编写的这套《高中外国史》在当时广受欢迎,它具备了优秀历史教科书必备的若干要素。这些要素超越时代,对今天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仍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注时代

杨人■在编写本教科书时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他叙述了两百年来的世界近代史,原因是“它与我们现代生活关系密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给予更多关注。在《战后之世界》一章中,他写道:“大战结束已经十五年。虽然这是这么短促的一个时期,可是它离开我们这样近,一切事变之影响于我们现在生活是这样密切,我们不得不多费一些篇幅来记载。”

当时,帝国主义诸列强对中国威胁最大者非日本莫属。为使学生通过历史更好地了解时事,杨先生对一战后的日本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其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的变化加以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学生对日本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个清醒认识。他回溯了日本外交的变化,指出:“日本近十年来外交,以对华最为重要”,书中特别提出与日本侵华有关的二十一条、五卅事件、阻挠北伐、九一八事变

和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等史实。他更分析了二三十年代日本政治制度的特征,强调军国主义势力的坐大。1932 年,日本发生犬养毅被刺事件,教科书不失时机地揭露其性质:“犬养毅遭暗杀,为日本法西斯势力抬头之表示”,并指出:“法西斯势力在(日本)民间也有所弥漫”。

环顾全球,杨先生觉察到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潜在危险。课本中一章以“民主政治的动摇”为主题,凸显法西斯势力的滋长。他在 1933 年编写课文时就指出,“德意是两个不得意的强国,同时也是两个反民主的法西斯蒂政治最强盛的国家”,详细叙述了两国内部反民主的普遍表现。教科书一语道破当时世界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战后的政治处处表示着议会政治的动摇,独裁政治之抬头”。

本教科书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它紧随一战后十多年近东和远东民族主义的发展,涉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如国联问题、赔款与战债问题、军缩问题和太平洋问题。它紧扣时势,分析了当时尚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恪守史学专业性

历史学科的特质在于它建立在时序基础上,在发展与联系中解释人类的过去。杨先生强调,他编书目的“在乎使学生能够从这里求得一种整个的知识,而不是一些支离破碎不相联系的个别记忆;在乎能把各个史实加以贯穿的叙述,须举目张,使学生能够认识个时代之变迁,及其变迁的痕迹”。

依据时序发展,它采用通史体例,主要涉及人类活动的三个方面,即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智慧生活。它不但涵盖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层面,还分析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动态发展。

本教科书的优点还在于其选材相对全面和平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史。除欧美主要国家外,它留给



杨人■和他编写的《高中外国史》



凸显史家修养

“弱小”民族很大篇幅,详细介绍了远东和亚洲的民族运动。教科书提到:“远东民族运动除中国国民革命外,印度自主运动为最主要。”它甚至没有遗忘 20 年代泰国、越南和缅甸的民族运动、朝鲜的反日运动、中国台湾的反日运动、菲律宾的独立运动和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的运动。

历史学科的特性还在于它对历史发展有一定的预见性,具有鉴古知今、预见未来的功能。结合现实,杨先生向学生说明:“现代的一切事实是整个人类文化积聚之最近的表现,或者说是人类文化进展到此阶段之必然结果”;“正如近代是大西洋时代,现代必定是太平洋时代”;“显然人类活动的重心已由大西洋而移到太平洋,愈到最近,愈觉得本期可称为太平洋时代”。

除应具备历史学科专业性外,中学历史教科书还应突出自身特色。因其读者是寒窗未开的少年,这就要求课本行文深入浅出、精练规范、通顺晓畅,朗朗上口。为此,杨先生特邀语言学家吕叔湘进行文字修改和润色,而且就选材和选图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相得益彰,使教科书既有很强的历史启发性,更具文学欣赏性。

中国有治史的优良传统,要求史家具备才、学、识、德。史才,要求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要求富有逻辑性和生动性,文字简约、条理清晰;史学,要求史学家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严谨考证;史识,意指作者的观念和立场,即如何解读历史,揭示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见解;“史德”则是对历史学家道德修养的起码要求。

历史研究与编纂是门大学问,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也不是小学问,而且可能是更难的学习。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者而言,上述四方面的要求非但不能降低,反而需要提高。杨先生在谈及本书编写原则时说:“我的原则是告诉人做‘人’的,是使人知道这个社会是经过怎样的变化才成今日的社会。”杨先生把看似零碎散乱的历史信息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通过缜密的历史逻辑和思维逻辑,借助通俗浅显的文字为学生们梳理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线索;在史才方面,他把自己的精深学问,在中学生可以理解的

层次上生动地娓娓道出。至于史识,杨先生告诉学生:“我们探索过去变化的原因,知道过去变化的状况,至少可使我们人类知道在最近的将来要走哪样的一条路。”他还指出:“海禁打开,中国站在世界中,不了解世界上的转变之痕迹,便无法应付。”由于受众是成千上万涉世未深、世界观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对编写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传递给他们。

此外,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来说,史德应倍加强调。杨先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中国人”来写,让历史教育为社会和民族服务。比如,在做出“太平洋时代”的预见后,杨先生向学生提出郑重告诫,“中国民族是否能尽其所应尽之责任,全在我们自己之觉悟与努力。”

作为历史学家,杨人■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他留英期间,在紧张学习的同时参加了中国留英同学的抗日救亡工作。获得牛津大学学位后,他原计划留欧继续学习。但抗日战争一爆发,他毅然回国,投身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正是对侵略者的仇恨激励他在教科书中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

杨先生具有正义感,在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同情革命。大革命时期,他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满,参加了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爱国学生的请愿运动,不顾个人安危,上街演讲。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平津解放前夕,不少人劝他离开大陆去台湾或外国,他均加以拒绝。

历史教科书质量如何,还取决于作者的综合人文素养。除有精深的中文造诣外,杨先生还熟练掌握英文和法文。他掌握的大量西洋原

文材料,使他的研究视野开阔,编写教科书时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杨先生认为:只要精通外语,了解国外研究状况,掌握必要资料,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国人就能进行独立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对今天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有重要启示:尽量掌握原始外文资料,少用甚至不用二手资料。中国历史人要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表达中国人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独立观点。

中学历史教科书作者还必须具备丰富的中学历史教学经验。年轻时代,杨先生先后在福建泉州、上海和苏州的中学任教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没有这种经历的史学家编写的中学教科书,水平固然很高,未必适合中学生使用。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杨先生这套教科书出版至今已八十个春秋,但它所体现的编写主旨仍有价值。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制定者和教科书编写者要坚持学科的专业性;以时序为基础,以通史为依托;努力揭示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互动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选材上保持相对平衡,世界史必须囊括“落后大陆”和“弱小民族”;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正确国际意识;历史教育与现实和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联系,把“僵冷艰涩”的历史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现实感悟;严格区分中学教科书与个人学术著述。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人民有独特的民族情感。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不是单纯的个人学术活动,而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国家水平的体现、民族追求的宣示和民族情感的抒发。

(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
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课题批号:10&ZD095)

25